

山西文学史

崔洪勋 傅如一 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文学史 / 崔洪勋, 傅如一主编.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457-0863-9

I. ①山… II. ①崔… ②傅… III. ①地方文学史—
山西省 IV. ①I 20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7491 号

山西文学史

主 编: 崔洪勋, 傅如一

责任编辑: 任俊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 书 章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63-9

定 价: 1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

崔洪勋 傅如一

副主编：

张正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杰 王增斌 王 醒 田禹疏 刘毓庆
苏春生 杨占平 梁归智 崔洪勋 傅如一
董国炎

序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气象:各省区的出版单位把出版的侧重点,倾注在对由古迄今的本地籍作家的作品集、选集、文集、研究资料和专著、纪念文集等的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历史性现象,它反映了我国的文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和推进的势头。因为,正如各个民族或国家、地区的文学创造活动,是构成完整的世界文学史的内容,在总体上显示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那样,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累丰富的泱泱大国,从古迄今,全国各省区都有自己的富有地方色彩、文化性格和审美观念的作家作品继续不绝地涌现,对我国文学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都各自有其独特的时代性贡献和历史性成就。也因此,正如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我国各省区的文学活动,构成了我国文学衍生发展与流变的自我规律和民族特点。

山西大学中文系的诸位同仁,集体编撰的这部《山西文学史》,是继前几年山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撰的《山西抗战文学史》以后,又一部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

山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策源地,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摇篮。历史进入现代以后,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山西文学又曾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一面新鲜旗帜。由于山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它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至风土民俗等方面

的特殊地方性格,从而形成了具有浓烈的山西地方风味、文化性格和艺术气质的山西作家群。这些作家,当以本省籍作家为主体,也间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山西落籍或生活与工作的外省籍作家们。从总的历史发展形势来看,可以说,山西“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历史的长河中,山西出现了像李愔、荀卿、韩非、王绩、宋之问、王勃、王昌龄、王维、柳宗元、司空图、温庭筠、司马光、元好问、萨都刺、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罗贯中、傅山以至赵树理等等,这一连串的享有盛誉的各种文体的文学家,他们虽然在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中外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甚至世界文学史著中,都占有应有的章节和篇幅,但从地区性的视角,从山西文学发展史的总体上来加以研究和论述,从而揭示山西作家共有的生活品质、文学性格、美学追求以及他们之间启承流变关系,总结山西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自我特色,我看不仅别具情趣,而且富有学术价值,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一种充实和发展。

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同仁们,正是凭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及在山西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或可称之为“半山西人”的外省同志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根据自己的长期生活实践体验以及在教学和研读上的感受心得,群策群力地编撰的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山西文学史》,对从远古到当代的漫长的三千六百多年的纷纭复杂的山西文学活动诸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行程,首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历史总结。从我阅读部分书稿后的粗浅印象来说,我认为它具有下面两方面的特点与价值:

首先,编著者们能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当做一件代表政府的学术事业来进行,能尊重客观历史实际,从历史本身出发,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的审视和评析,勾勒出由古迄今的山西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同时探讨了山西文学自我发展的内在规律,它

们之间的启承流变关系,以及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现象,历代的山西作家所共同具有的生活气质、文化性格、文学风格以至乡土气息和语言特点,他们在各种文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和发展与自我特色,以及他们的艺术创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贡献。例如,编著者们认为,山西文学始终贯穿着一条淳朴、豪放、苍郁、直情的美学风格纽带,就很合乎实情,而非浮夸溢美之辞。

其次,编撰者同志们能从今天的历史高度上,用当代意识来观察和描述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探讨山西文学中各类文体流派的源流与兴衰,突破了习惯性的单一而平面地罗列作家作品的机械排列模式,从纵向联系和横向比较入手,环环相扣,以确立整体观念的文学史格局,在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借鉴、更有所发展与突破,也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创新之见。

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立论也比较实在的具有自己学术特色的地方性文学史著作。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花过大心血,下过苦工夫,是难以达到现在这样规模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它的出版,对我国地区性的文学史研究,必然有它的启迪和促进意义,也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也因此,它必然会受到国内外的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注目和赞评。我作为一个大半辈子在外地生活和工作的山西知识分子,深深为故乡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那种勇于开拓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严肃治学态度感到高兴和振奋。也正是出于这点激情,我写了这篇称之为序的小文,以寄托我的敬意和期望。

正如俗语所说:“万事开头难。”这部山西文学史虽然是一部地方性的文学史著作,但所涉及的历史时间跨度却很大,光资料的搜集、鉴别与整理,就是一个千头万绪的难题。从全书的整体看来,如前所

述,山西大学中文系同仁们的努力成果,是积极的和有效益的,何况它敢于为天下先,是全国第一部地方性的文学史著作。但人是历史的存在,更是时代的产儿,历史总是有它的时代特点,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的。因此,我也相信,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原因,这部《山西文学史》所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通过编撰者同志们以后在教学、科研实践中的自我检验,以至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审评和议论,必然会在它以后的再版本中,通过校补,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的。

贾植芳

1991年7月10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凡 例

一、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文学史,包括山西古代、近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

二、古代文学史部分所称“三晋文学”,是因为山西自古称“三晋”(赵、魏、韩),其地域范围实际上比现在的山西省要大得多。编者认为,从历史文化渊源方面考虑,写“三晋文学”更能反映古代山西文学的历史风貌。

三、选入本书的作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山西籍作家。虽然有的山西籍作家的主要创作活动不在山西,也一并选入,如王维、柳宗元等;第二种是外省籍作家,在山西生活与创作,对山西文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如皇甫枚等。至于偶尔在山西游历或作短期居住者,如李白、李商隐等,一概不论及;第三,有的古代作家,如王昌龄、罗贯中等,其籍贯有争议。本书不在籍贯上作学术探讨,也入选。

四、本书所收入的当代作家均以全国作协会员为准,同时根据收入作家的具体情况和本书内容要求或繁或简论之。

五、本书编年,自远古断至 2010 年。

绪 论

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部完整的地方性的文学史。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的《中州集》,收集了中原地区的作家作品,只能算作区域性的文学史料。各种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也只是地区性的作家作品的罗列。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缺陷。

近十年来,许多地方都开展了关于某一文学大家地区性文学创作活动的研究,如四川注重研究陈子昂与杜甫,广东注重研究张九龄,陕西举办王维诗歌学术讨论会等等。不仅有活动,而且出刊物,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我们山西对“山药蛋派”的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注意。这种地方性研究的繁荣,应该说是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之一。随着这种地方性研究的勃兴,地方性文学史必然会应运而生。我们这部《山西文学史》,就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产物。虽然还相当粗糙,对地方性文学发展的源流及其内在的规律性,还把握的不十分准确,但我们相信,这项研究是有意义的,是能启迪后人的。

山西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国文学的成长壮大紧密连在一起的。由于山西在政治、经济、地理、民俗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色彩。

山西文学以公元前十世纪的神话传说至春秋时期晋文学的形成作为开端。直到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山西当代文学,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约三千六百年。在这三千六百年期间,山西人民创造了

自己的光辉灿烂的文学,它们包括山西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四部分。

学习、研究山西文学的今天,就必须认识了解山西文学的昨天。今天的山西文学是从昨天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根据地文学运动,经过长期、复杂的发展变迁而来的。它们之间不论在认识价值、风格观念,还是在美学理想、语言格调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山西历代文学发展演变中的成就、规律和优良的民族传统,才能正确地建立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才能科学地认识和确定山西今天文学的概貌和发展走向。在山西悠久的历史中,产生过为人民所爱戴的著名的作家,他们创作了为人民所传诵的作品,比之全国其他省区的优秀作品毫无愧色。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肯定山西历代文学的价值。这样,我们就能通晓山西文学的发展源流和脉络,让山西优秀的文学遗产对今天文学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从而创造出更现实、更精彩的当代作品来。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应描绘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生活,揭露黑暗,颂扬光明。山西古代文学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作品,是当时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时代主潮的集中体现。尤其山西现代文学,其主流部分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学,反映了山西人民的斗争生活,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山西文学史是一部淳朴、沉郁型的美学史,自先秦晋文学发展至今的作家作品中贯穿着一条纯朴、苍郁、直情的风格线,它真实地表达出当时人民的审美情趣和愿望。

我们按一般历史分期将山西文学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并尽可能比较系统和科学地剖析、论述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但是我们并不排除从文学形态本身的特征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因为不论作家风格或流派的演变发展以及对优秀作品、作家的流传和

继承常常有着难于分割的内在联系,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任何时代发展演变所不能阻遏的。比如“山药蛋”文学流派萌发于现代文学时期,实际在当代文学时期才正式形成。

学习和研究山西文学史要发掘历代作品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表现手法。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人民的生活是悲惨的,在人民中间有很多生动优秀的、反映百姓饱经压迫生活的民间创作。而一些对现实不满,出身于官宦、富有家庭的知识分子,同情过着悲惨生活的人民,他们联系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在作品中或揭露统治者的黑暗,或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或抒发人民的情感,或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他们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山西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如《诗经》的一部分作品,柳宗元的散文,元好问的诗词,关汉卿的戏剧,赵树理的小说,等等,他们都能深入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生动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是山西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我们必须认识和继承这一悠久的优良创作传统。

学习和研究山西文学史,应当对历代作品的表现手法、文体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和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虽然手法的运用和形式的变革,一般是由内容规定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还要从形式本身,认识它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比如唐宋词的产生是和当时的音乐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魏晋以来山西的诗歌的发展与民歌关系非常密切。山西的民间文学是丰富的、源远流长的,历代山西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的形成,几乎都与民间文学有密切联系,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经过加工、提高,成为艺术成就光辉的作品。

此外,山西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有特殊色彩的,因为它受到独特的山西地方方言的变化的影响。尤其山西的一些诗歌、戏剧和民间文学作品,在历代流传过程中,往往不断地染上了不同时代地方方言的色彩。当然,山西文学的发展也给山西地方话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变

化。现当代文学的“山药蛋”文学流派就是一个有力的实例。所以对语言和文学互相影响的探讨,从多种因素认识文学形式发展的渊源,仍然是今天研究山西文学史的重要探讨课题。

优秀作品将会影响文学本身的发展,一个新题材的运用,一种新风格的出现,都将可能流芳百世,影响颇深。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关汉卿的《窦娥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在山西文学史上的作用从来没有间断过。文学以它特殊的感染力量,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文学本身。因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典型选材和创造在具体形象上体现着客观发展规律,并给人以教育和美感作用,从而变成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成为发展、丰富自身的重要因素。

纵观山西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作家气质、创作风格到作品特色,有一条极为近似的艺术纽带贯穿其内,那就是淳朴、豪放、苍郁、直情。这条具有鲜明色彩的纽带是千百年来位于华北高原上黄土地貌特有的民族气质孕育的结果,是勤劳、淳朴、务实、进取的山西人民的情感、愿望、理念和志趣的结晶,是历代作家与大自然、恶势力的矛盾斗争中磨炼而成的。

自远古流传于山西境内的神话,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都体现了三晋先民坚韧不拔的淳朴精神。理趣深蕴、形意质朴的民间神话产生于背依太行、滨临黄河的古老文化的沃土上,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的劳动。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世代代坚韧、顽强地奋争着,劳动着,构成了先民们性格的基本内因和特征。这必然要给山西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作品的源头,周代、春秋的民间诗歌,在晋文学史上影响是巨大的。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与民间文学的滋润和熏染有直接关系的。《诗经》中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当属唐风《伐檀》,魏风《葛屨》的质朴务实民风,它们语言简练、生动,内容忧

思、沉郁,极富感染力。历代作家都把它们当做启蒙读物和文学典范,而世代相传,潜移默化,逐步打下了山西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根基。

先秦散文,百家争鸣,三晋大地进入文学繁荣时代,晋文学史上出现第一个创作高峰。晋国《师旷》具有浓郁传说色彩,对后代文学风格影响甚大。魏李悝文章平实,逻辑性强。而荀卿散文析密思精,层次清晰,尤其他不信天道鬼神,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哲学观点,很有进步意义。他的《成相篇》是最早的说唱文学,对后世极有影响。韩非与荀卿政治观点不同,但文风锐利、透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严峻刚毅,形象生动。荀、韩散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们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观点鲜明,情感充沛,有说服力。汉代许多政治文就是承袭了他们的法家观点和风格。

北朝,晋文学的深沉、粗犷、豪放、自然的特色,有天时、地利之因,而对秦汉诗文遗风的继承,也是不无关系的。

唐代山西文学的繁荣,应当说是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据《全唐诗》辑录,山西诗人有一百多人,诗歌总数在四千首以上,约占全唐诗总数的百分之八。自称“太原白居易”的其人其诗,尚不在其内。三晋唐诗的繁荣,单从数量上还说明不了问题,重要的是三晋唐代诗人的突出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初唐的王绩、王勃、宋之问,为开创唐诗的繁荣局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盛唐的王维,在艺术上是堪与李、杜三足鼎立开宗立派的大家。而王昌龄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七言绝句,在唐代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中唐柳宗元的散文在唐代只有韩愈称得上是与之并驾齐驱。中唐的“大历十才子”虽然后人对他们评价不甚高,但其中的卢纶,历来受人重视。晚唐的司空图以《诗品》独步诗坛,温庭筠以词为花间派鼻祖。在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唐代文坛上,山西作家群的奇光异彩,自始至终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故此,在山西文学史上形成了第二次创作高峰。

山西文学在北宋时期的风格仍然是朴实、雄放。如王溥的诗文情

真、蕴切；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生动朴实，文笔酣畅，这部历史巨著，从内容到形式，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

宋金时期最著名的大诗人元好问就在这繁荣的沃土中成长起来，他以诚为本，以真为贵，以唐诗为典范，而发展了强调生活实践、真情实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成年之后，适逢乱世，人民生活涂炭，灾难深重，从而激发了他的反战爱国情绪，所以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真淳、清雄、沉郁、悲凉的艺术风格，为当时诗坛树立了风范。浑源刘汲的野逸、豪放，太原李汾的柔壮、高远，李纯甫的真实、自然，赵元的沉挚、质朴，尤其代州的萨都刺深切同情农民，揭露贵人荒淫生活，以意以情，充溢于诗文之中。这一群体的习俗、气质对于处在黄土高原的三晋文学的固有风格更加浓郁、显明。

元代山西文化极为发达，文学风气浓厚。由于当时默认一种“浪子”意识，作家投身于社会内层，生活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出于当时地域特色、时代环境和人民习俗，使得山西由北到南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尤其俗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如应县木塔珍藏的《大乘杂宝藏经》变文、《华严经》讲经文等，很富于故事性和艺术性，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于山西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晋南一带发现的金代戏曲文物，说明当地戏曲的繁荣景象，同时也证实了山西在中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位置。戏剧繁荣本身就说明文学和人民的贴近、和时代的密切关系。文人和普通人民接触的机会较多，这样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就自然注入了积极的现实主义因素，从而不断出现新作家和新作品。

“铜豌豆”关汉卿及蜚声当时曲坛的白朴、郑光祖等是山西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们体现了山西文学历代风格发展的特色。而且从元代三晋作家群整体来看——诗文戏曲全面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而再次把山西文学推上创作高峰。这批高峰作品在内容、手法和影响上对于山西传统风格的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

环节作用。关汉卿笔下许多光辉形象如关羽、赵盼儿、谭记儿、窦娥等的身上凝聚着作家至死不屈的反抗叛逆精神。这种“铜豌豆”的气概和品格是山西人民勤劳、刚直、纯朴的传统作风的集中体现,而且可以从自此以后的山西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作家的人品和作品中反映出来。

自明朝以后,白话小说成为山西文学的主流,其标志是《三国演义》等辉煌著作的出现。由此,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文坛重要一翼。《三国演义》作家太原罗贯中就是当时重要通俗文学作家。他作过戏曲,写过乐府,但毕生主要贡献在小说上面。他的《三国演义》不论对战争策略、政治斗争的描写,还是对宏伟的小说结构设计和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都将刚刚萌发的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它不仅丰富了我国文学宝库,而且对山西文学尤其是山西通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清代傅山在诗文方面追求朴拙雄健之美,情感强烈,内涵丰富,更由于具有奋发昂扬、悲壮坚毅的精神,而在文坛独树一帜。傅山不仅诗文盛名,更擅戏剧,他对清朝杂剧写本中不宜于民间舞台演出的缺点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

自元代以后,山西戏曲演化发展极快,与民间文学结合而形成山西梆子戏曲,同时有一批优秀剧目产生保留下来,这些剧目大部分是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创作结晶。这在清末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尤其突出。

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自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人民掀起如火如荼、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此同时,政客阎锡山乘机借山西地域特殊的特点,在山西建立封闭式的军阀“王国”,企

图割据一方。山西文坛则处于难以忍受的窒息状态,逐渐落后于全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正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所说:“新文化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由于阎锡山长期封闭式统治,以至迫使山西文学恪守传统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孕育着自己独特的创作理想和追求。

“五四”运动推动了山西新文学的萌醒和发展。高长虹、石评梅、李健吾、贾植芳、王玉堂等以文学作品痛斥封建道德,鞭挞黑暗势力,呼唤光明、自由和解放。他们是开垦山西新文化的主将。其中高长虹尤为突出。他组织全国闻名的狂飙社,愤怒揭露和斥责反动统治者的黑暗政治,从而形成狂飙运动。他在各类作品中以真实、冷峻、深沉的笔调,控诉镇压爱国行为的罪行,有较强的社会意义。石评梅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意识,憎恨黑暗,憧憬光明,真诚磊落,正直无私,在她的作品中以妇女解放为主要题材,显示出坚定的革命意识和悲壮情感。

“左联”的成立,对山西新文化运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春风透过娘子关,吹暖三晋大地。当时在进步文学青年如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田景福、张季纯等的倡导下,山西文坛坚持了“普罗文学”方向,坚持了与现实斗争结合的文学大众化。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新文学已经成山西文学的主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地处抗日前线,全国进步作家纷纷来晋宣传抗日,开展斗争,掀起抗日文学热潮。如1938年在延安组织的抗日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和鲁艺战地服务团,重庆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和上海组织的抗日救亡演出队筹。他们和山西作家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抗日文学创作大军,创作出大量真实感人的反映战争史实、军队奋战英雄事迹和山西农村的斗争生活等现实主义作品,从而在山西文学史上又形成了一次新的创作高峰。在山西大地上的这个第四次高峰持续到毛泽东《讲话》发表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高峰期汇聚到山西的作家有高敏夫、田间、艾青、方殷、天兰、卞之琳、何其芳、公木、袁勃、高咏、柯岗、丁玲、吴奚如、肖红、端木

蕓良、蒋弼、康濯、肖牧、碧野、周而复、周立波、舒群、杨朔、吴伯肖、范长江、沙汀、刘白羽、陈荒煤、宋之的、王礼锡、白朗、罗烽、葛一虹、以群、黄钢、肖三、李公朴、冯牧、曾光、华山、聂绀弩、崔巍、王震之、李伯钊、成荫、欧阳山尊等等。他们有的工作到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几次来山西活动。他们对山西抗日形势和山西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描写的几乎近似的题材，但却表现出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手法，创作出许多风靡全国、经久不衰的佳作，使山西文坛一时呈现题材、内容、形式多样化的繁荣局面。使山西文学界开阔了艺术视野，扩大了题材信息，浓郁了风格色彩，对于之后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此期间，山西本省作家冈夫、贾植芳、赵树理、姚青苗、高沐鸿、郑笃、力群等也都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如冈夫在1925年就用诗表现对社会的愤懑，探索生活的真谛，1932年在《粉笔标语》诗中描述了自己参加革命活动后的心情和信念。贾植芳1928年在太原发表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在山西中条山抗日部队工作时发表一系列作品，如速写《距离》、文章《悼黄浪萍君》、书信《从中条山寄到重庆》、小说《嘉寄尘先生和他周围》《我乡》等，揭露社会黑暗，歌颂抗日英雄。他的作品深刻、形象，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青苗1932年加入山西“左联”，开始创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发表近百篇作品，形成朴实、含蓄、浓郁的创作风格，如《中条山的杜鹃花》、《特鲁木齐的夜》、《猫儿盖》等，对当时文学青年启迪、鼓舞较大。赵树理早在1929年就开始创作，1932年发表诗歌《歌生》、1933年发表中篇小说《有个人》、1934年发表长篇小说《盘龙峪》等。此时作品呈现出多样化、多风格的创作格局，反帝反封建是当时作品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以及全国斗争形势的需要，文艺要解决民主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家在新的形势下要深入生活实际，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千百年来文艺所探求的正确的发